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主编 李学勤 郭志坤

西周史

黄爱梅 著



周武王灭商后建国，定都于镐，史称「西周」。历十一代，十二王，绵延二百七十五年。青铜铭文有载，夏礼、商礼和周礼一脉相承，而周礼最完备，成为时人崇尚的行为规范。「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人们心目中，周代的文明礼仪垂范千古。

上海人

版社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9 787208 126282

定价：48.00元

易文网: www.ewen.co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主编 李学勤 郭志坤

西周史

黄爱梅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周史/黄爱梅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李学勤, 郭志坤主编)

ISBN 978 - 7 - 208 - 12628 - 2

I. ①西… II. ①黄… III. ①中国历史—西周时代—
通俗读物 IV. ①K22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2396 号

总 策 划: 郭志坤

策 划: 上海文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监 制: 王兴康 朱锦川

出版统筹: 孙 瑜

特约编辑: 郭 泳

责任编辑: 高笑红 张钰翰

美术编辑: 傅惟本

电脑制作: 郭剑华

地图绘制: 陈伟庆

地图审图号: GS(2014)1228 号

·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

李学勤 郭志坤 主编

西 周 史

黄爱梅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3 插页 5 字数 216,000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2628 - 2/K · 2293

定价 48.00 元

大孟鼎（陕西岐山礼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史墙盘（陕西扶风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史墙盘铭文



线方鼎甲（陕西扶风庄白村出土，扶风县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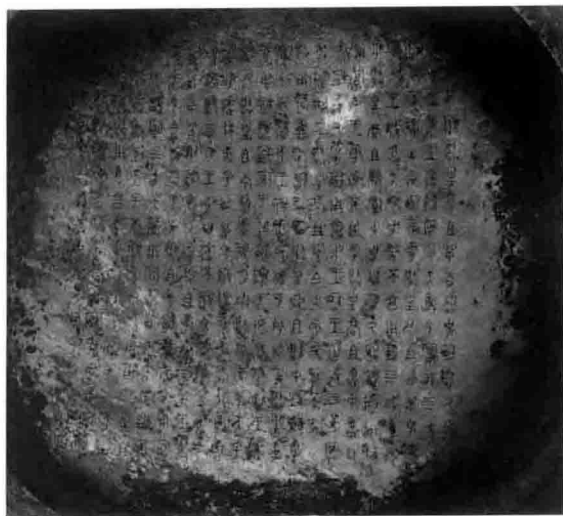
母癸甗（上海博物馆藏）



毛公鼎（陕西岐山出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折觥（陕西扶风庄白村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逯盘铭文（陕西眉县常兴镇杨家村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日己方彝（陕西省扶风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凤鸟衔环铜熏炉（雍城遗址出土，陕西省凤翔县博物馆藏）

注：封面彩图为折觥。插页彩图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杨宽著《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序 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的多年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作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不少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于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性质和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体裁与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总会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



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作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8月17日



序 二

我和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通俗普及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回忆起吴晗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向学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民众。”吴晗不仅撰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影响很大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这段回忆让我们萌发了组织编纂“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打算。

当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编纂方案后，他认为，这对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励人是极有意义的事，很值得编纂。随后，我们又把多年酝酿的编纂构想作了大致的概括：突破“阶级斗争为纲”和“残酷战争”描写的局限，注重于阶层、民族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记述；突破“唯帝王将相”和“否帝王将相”两个极端的局限，注重于客观反映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及“厚生”“民本”思想的弘扬；突破长期分裂历史的局限，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无论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绍中华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响力；突破历朝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话传说等口述历史与文物文献并行；突破单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图文并茂，以考古文物图表佐证历史。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编纂重在创新、面向大众和通俗化。李先生认为这一美好的愿望和构想，要付诸实施并非容易的事。他特别强调要组织专业队伍来撰写，并提出“让历史走向民众是史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写这部“丛书”的作者本身就是教师。他们中有的是学殖精深、卓有建树的史学名家，有的是常年立足于三尺讲台的传道、授业、解惑者，有的还是以“滔滔以言”享誉学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为年轻的历史学博士。由这样一个教师团队来担当编写中国历史读物的重任，当得起，也信得过。



我们把编纂的原则性方案统一后，在同作者商议时遇上了某些疑虑：一是认为这类图书没有多大市场，二是认为通俗作品是小儿科，进不了学术专著之殿堂。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后，我们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昨天的历史是创造明天的向导，从中可以汲取最好的营养，好的历史通俗读物是很有市场的，因为青年读者中普遍存在一种历史饥饿感。本套“丛书”的作者深感，编写中国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工作者最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旅外学者得悉我们在编纂这套“丛书”，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德文参加撰写并专门来信期待我们早日推出这套丛书。信中说：“在知识大众化、数字化的年代，历史学者不应游离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微知识的渴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的通俗表述为微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积淀和范本。”行文虽然不长，但一语中的，说清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华东师大历史系王家范教授等读了“丛书”的文稿后还专门撰文评说，认为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又是一套严谨而富于科学精神的史著，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为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很有作用。

这一切，让我们得到莫大的鼓舞。作者在通俗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写作中进行了刻苦再学习。从史实的查证，到篇章的构架，再到文字的通俗易懂以及图片的遴选，都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丛书采用章节结构的叙史形式，目的在于从目录中就一目了然书中的大概内容。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读史者历来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读起”之叹，讲史时“以时间为纲”，即可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来，再辅之以“专题为目”，这样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题、把握中心。细讲中注重故事取胜，以真实的历史故事吸引人、感动人、启迪人。图文并茂也是本丛书通俗化的一途。中国历来重视“右文左图”，以文注图，以图佐文。

通俗而雅，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建立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而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并强调的通俗。本套丛书的学者们在撰写时一是力求在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诘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所以说，深入浅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种学术活动。



为了增加生动性、可读性，作者尽量选择对某些有意义的人和事加以细讲，如对某些重大的出土文物的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对某些神话传说进行诠释。在图表上尽量做到随文佐证。在每册图书之后增加附录，旨在增强学术性和通俗性：附录“大事记”，旨在对本段重大历史事件有个大致了解；附录“帝王世系表”，意在对本朝创业、守业和虚位之王的传承有所知晓；附录“历史地图”，在于对本段历史地理形势方位有个立体印象；附录“主要参考书目”，目的在于提供进一步学习本段历史的索引。

意愿和努力是如此，最终的结果如何？诚望读者鉴定。

郭志坤

2014年8月19日



导 语

孔子曾经说过：“周监（通“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为周代借鉴和吸收了夏、商二代的文化成就，形成了那样浓郁、那样繁华的周文化，所以孔子说：如果要我在三代文化中发表一点见解的话，我更加倾向于表彰和提倡周文化。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打开周史奥秘的一把钥匙。

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长篇记述了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请观于周乐”一事。故事很生动：季札首先听了《周南》、《召南》、《卫风》、《唐风》、《曹风》、《陈风》等各地民歌，赞叹道：“这就是华夏各地的乐曲，都是那样的美好，而且各个地域展现了本地区独特的美好风貌。”后又观看了武王时代的乐曲《大武》，说：“好啊，我从中看到周王室盛极一时的风貌了。”接着看了禹王乐舞《大夏》，说：“好呀，勤劳治水而不居功，除了大禹，又有谁能建立这样的大功呢？”看了虞舜的乐舞《韶》后说：“舜的功劳大到顶点了，像苍天那样覆盖了一切，像大地那样承载所有，真是尽善尽美啊！”季札当时也可以说是周游列国，而要数在鲁停留的时间最长。

这里介绍一下季札其人。从季札往上推，他的二十世祖就是周文王的兄长太伯和仲雍，为了让贤能的周文王能继位，兄弟俩双双出走，来到了蛮夷之地吴，建立了吴国。他这次巡访中原，完全可以说是一次寻根之旅。他的身上既流淌着周人的血脉，又有着南方吴人的气韵。让他来品味周文化，是再妥帖不过的了。可不是吗，他从周乐中看到了三代文明的传承，看到了三代中前代对后代的影响，看到了周代文明在各地的繁荣。

周代那种“郁郁乎文哉”的文明，是一种礼乐文明。吴公子季札之所以对周的乐文化赞叹不已，是因为这种乐文化中浸润着深厚的礼文化要素。在中国，礼、



乐从来不分家。周代的《诗》分为“风”、“雅”、“颂”三体，代表着礼的不同的文化层面。“风”指民风，是不同地域的民间文化精粹，体现着大众层面的文化形态；“雅”是周王室及京畿的乐曲，是中原华夏地区的礼仪载体；“颂”是周最高统治者用于祭祀和其他重大典礼的乐歌。“风”、“雅”、“颂”用途不同、声调不同，所用的乐器不同，演奏面对的对象也不同，且歌且舞时的礼制也不同，一点也乱不得。看，礼和乐二者多么水乳交融。

以礼乐文化为轴心所形成的社会秩序，在周初达到了完美的极致。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是给整个周代社会定下了基调。中国是诗之国，诗是一种娱乐形式，更是一种教育手段，名之为“诗教”。诗教把人们的精神振兴起来，这叫“兴于诗”。“兴”的目的是“立”，即要大家立身于礼、成全于乐。这里的乐已经鲜有纯娱乐的意味，而是礼的一件华丽的外衣。

诗教、礼教、乐教三位一体，这就是周文化。周代的种种社会存在，都是与这种周文化关联着的。西周时代，是中国早期国家的成熟阶段。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可见西周国家的形成，借鉴了夏、商的传统。近人王国维先生又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表明周代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与夏、商相比已经有较大的进步。要知道，这一时期西周王朝在实现统治过程中所形成的种种原则或制度，例如分封制度、宗法制度和“礼乐文明”等，都堪称西周时期遗留给后世的“政治遗产”，对从秦汉到明清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形态、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意识形态，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西周制度和文化的创制之功，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涵。那么，周人到底进行了怎样的变革，又是如何改变了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的走向呢？

分封制度是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目的就在于“兼制天下”（《荀子·儒效》）。怎样去“兼制”这么大的一个天下呢？单靠武力显然是不够的，必须靠文治。周公很聪明，他在授予诸侯国土地和人民的同时，还授予仪仗、礼器、乐器，要他们一切依礼乐而行。比如正式场合奏乐歌舞时，“天子八佾（一佾为八人的行列），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一点都乱不得。巡视的人到列国明察暗访，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是怎么回事了，对周天子忠不忠，从礼乐上就可以一眼看出。

井田制是周代的重要经济制度。井田制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已经不怎么讲得清了。但西周时实行过井田制，大致上是可以肯定的。那时大家把田方方整整地



划成井字形（大致上），其中大部是私田，少部分是公田，也称籍田。天子以及各级贵族最关心的是籍田。这里也有礼制：一是“公事毕然后敢私事”，先公后私，先耕好公田（籍田），然后各自去耕私田。二是实行“籍礼”。耕籍田时贵族到现场看护，带领众民行籍礼——唱赞歌、行籍礼，大约还有宣誓一类的仪式。周代的礼乐文化进入了田头地角，简直是无所不在了。



目 录

序 一	李学勤	1
序 二	郭志坤	3
导 语		1

第一章 先周历史

第一节 后稷传说	1
第二节 周人迁徙	3
第三节 周原创业	7

第二章 周邦肇始

第一节 文王之前的殷周关系	9
第二节 文王建业	12
第三节 武王克商	15

第三章 “其命维新”

第一节 平乱与东征	19
第二节 周人的天命	26

